

孫髯翁傳奇



余年生◎著

云南出版集團公司
雲南人民出版社





孫 麟 翁 傳 奇

余年生◎著

云南出版集團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髯翁传奇 / 余年生著 .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222-10609-3

I . ①孙… II . ①余… III . ①孙髯翁 (1685 ~ 1774)
— 生平事迹 IV . ①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9752 号

责任编辑：吴 磊
整体设计：杨晓东
责任校对：三 石
责任印制：洪中丽

书 名	孙髯翁传奇
作 者	余年生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300千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排 版	昆明市西山区子芑图文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0609-3
定 价	32.00元

身在天涯心在秦，白头信庾泪沾巾。
客中作客难为客，春日寻春那当春。
六诏应多新地主，三原岂少旧乡亲。
近华浦上波千顷，不信云南有此人。

——【清】董懋泉：《题髯翁夫子凯歌后》

小时候听祖辈说，在明朝时，老家是在应天府（今南京）柳树湾高石坎，后来或许是随沐国公沐英戍边垦荒，或许是因为吃了官司，被发配到蛮荒的云南。先人们向南迁徙，脚步停留在美丽的滇池畔，于是建房开地、繁衍生息，不声不响延续了十余代……生于斯，长于斯，于是热爱这个新的故乡，反倒是把祖籍变成为了梦中的神游之地。从小耳闻目染、道听途说，便知道了些许云南的历史故事。自己虽然不擅文字，却有着企图表达养育之地风土人情的冲动，于是拿起了秃笔，在格子上笨拙地写下了《孙髯翁传奇》几个字。

离开喧嚣、放下烦恼，品茗一杯幽香的普洱茶，搜寻历史的碎片，陪伴您走进三百年前神秘的红土地，回游三迤大地那使人流连忘返的迤迤山水，走进孙髯翁的布衣生活，体味平民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细细思索、解读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诠释人生的真谛……

——题记



主要人物

- 孙髯翁 原籍陕西三原县，字髯翁，号熙庵。
- 鄂尔泰 清满洲镶蓝旗人，西林觉罗氏，字毅庵。任云南乡试主考、云贵总督。
- 禄阿木 米贴土知府的女儿。
- 赵敏 字瑞杰，云南大理州人，孙髯翁的学生。
- 苗漪 字雨亭，云南弥勒县人，曾任昆明五华书院山长、河南澠池县令。
- 孙建仁 孙髯翁的父亲，李定国的部将。
- 李大奇 李定国的部将，出家后法号净明。
- 李定国 明末清初起义军将领。
- 鄂宁 鄂尔泰之子。
- 清虚 昆明圆通寺的僧人。
- 禄永孝 米贴土知府。
- 禄氏 禄永孝的妻子。
- 波罗友拉 弥勒西山彝族头人。
- 沙红 波罗的女儿。
- 李玉梅 孙髯翁的母亲。
- 孙春梅 孙髯翁的女儿。
- 李善勤 云南弥勒县人，孙春梅的丈夫。





目 录

前言 / 1

孙髯翁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青年时代他就怨恶八股文，鄙夷科举制度，立誓终生不仕；清高孤傲、关心民众的疾苦；疾恶如仇、不阿权贵；文采飞扬、潇洒自如，显示了特立独行的张扬个性。本书试图以史实为“经”、以虚构为“纬”，以传奇的形式，对其平民思想及生活进行文学演绎。

第一章 亡命从军 / 11

顺治三年四月，陕西三原县大旱，为争夺水源，孙建仁误伤人命，逃亡途中偶遇李定国部，遂追随义军入滇。李定国保护永历帝撤离昆明，辗转滇西。为保护义军财产，李定国命孙建仁潜留昆明，负责转移藏匿在圆通寺潮音洞中的财物，支持义军“反清复明”的斗争。

第二章 秋闱风波 / 23

康熙二十四年，孙髯翁“呱呱”坠地时，嘴唇边与鬓角都有细细的茸毛，似胎毛，又似胡须，观者莫不惊异。孙髯翁对科举制深恶痛绝发誓永不赴秋闱之试。孙髯翁初识鄂尔泰，两人以诗文相交。



第三章 五华书院 / 43

雍正四年十月，云贵总督鄂尔泰着手对五华书院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并向书院捐赠万余卷书籍。孙髯翁在五华书院结识滇西学子赵敏，收其为徒，成为忘年之交。邂逅米贴的禄阿木。

第四章 情结弥勒 / 57

弥勒发生瘟疫，孙髯翁为民众义诊。知县张德厚封锁疫情，赵敏智斗江湖骗人道士。孙髯翁与禄阿木深入西山黄花箐采集夏枯草，并救治彝族头人波罗友拉女儿沙红，波罗友拉头人盛情邀请孙髯翁等人参加火把节。

第五章 阿细跳乐 / 77

六月的彝寨是花的世界、歌的海洋。在火把节上彝家人斗牛、抬跤，对歌、对舞，尽情地狂欢。头人女儿沙红用歌声表达了对禄阿木的爱恋，偶然中她发现了禄阿木的秘密……

第六章 西窗剪烛 / 95

鄂尔泰准备用武力在东川、乌蒙、镇雄等地实施改土归流的计划得到雍正的大力支持。省督府诱捕米贴土知府禄永孝迫使其归顺朝廷，禄永孝悲愤交集举刀自刎。孙髯翁帮助禄阿木逃离昆明。

第七章 米贴悲歌 / 113

禄氏联合川东、黔西彝族，设计在补年节歼灭清兵500余人，鄂尔泰派兵反攻米贴。孙髯翁亲眼目睹彝族民众惨遭清朝军队杀害，悲痛欲绝，质问鄂尔泰并请求免除禄阿木死罪。禄氏遭凌迟处死。

第八章 滇西跋涉 / 135

孙髯翁、禄阿木在禄劝考察水情，雨夜之中，禄阿木欲以身相许，向孙髯翁诉说爱恋之情，遭孙髯翁婉拒。两人在武定狮山巧遇赵敏。孙髯翁一行三人考察金沙江、丽江、大理后提出了开发金沙江的设想。



第九章 治水盘龙江 / 151

乾隆年间，昆明府连续发大水，洪灾泛滥、民不聊生。孙髯翁为云贵总督鄂尔泰谋划治理盘龙江，禄阿木误认为孙髯翁投靠官府，愤然与其绝交。禄阿木在真庆观刺杀鄂尔泰未遂，惨死狱中。孙髯翁满怀悲愤继续考察盘龙江，撰写了《盘龙江水利图说》一书，暗下决心，从今往后不为官府之事再进一言。

第十章 对联大观楼 / 167

乾隆二十一年仲夏，孙髯翁、李因培、孙鹏、唐药洲、杨永芳、施炯、徐敏等相约在大观楼聚会，举行楹联赛会，孙髯翁即兴作天下第一长联，名噪一时、流传至今。

第十一章 圆通夕照 / 183

孙髯翁晚年生活十分拮据，他甘愿寓居圆通寺，过着以石洞栖身，以卖字求生的清贫生活，同时，尚有一份深深的情结，他没有向清虚大师透露。

第十二章 桑榆晚晴 / 201

孙髯翁晚年投靠女儿、女婿，寓居弥勒三道桥村，与苗雨亭兴办义学，两人在弥勒寺畅谈生与死。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初九日，孙髯翁安详地坐在椅子上，无疾而终，手中还紧紧地握着那支滴着墨汁的笔。一代文学巨星默默地陨落在偏僻、宁静的新瓦房村。

附：孙髯翁作品精选 / 217

后记 / 236

孙髯翁不仅仅是凭借一副大观楼长联而一夜成名，不仅仅是“联圣”，他的著术成果颇丰，涉及对联、诗词、文章著作，他的足迹踏遍大半个云南，可与徐霞客比肩，称他为著名的探险家、旅行家、水利学家是不为过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的封建社会，他敢于藐视科举制度，摈弃世俗观念，安于平民生活、坚持洁身自好的平民思想。



前言

——兼论孙髯翁平民思想的成因与价值

彩云之南、人杰地灵，在三迤大地，曾经涌现了一大批风流人物，孙髯翁就是其中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孙髯翁，生于康熙二十四年，卒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685~1774年）。字髯翁，号熙庵，原籍陕西省三原县，是我国清代著名的文学家、旅游家、水利学家。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可以从多角度、多层面来描述与评价。但是追寻他九十年的生活轨迹，可以看出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平民思想贯穿始终。从青年时代他就怨恶八股文，鄙夷科举制度，立誓终生不仕；清高孤傲、文采飞扬、潇洒自如；一介布衣，却关心民众的疾苦；疾恶如仇、不阿权贵，显示了他特立独行的张扬个性。那么，他的这种平民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其核心价值又是什么？都值得深入的探究与分析。本书就是试图以史实为经、以虚构为纬，以传奇小说的形式，对其平民思想进行文学演绎。

一、孙髯翁平民思想的成因

（一）时代背景

讨论孙髯翁生活的时代背景，首要的问题是要确定孙髯翁的生卒时间。

孙髯翁究竟生于何时？

据易问耕先生考证，孙髯翁生于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岁（公元1685年），这可由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岁（公元1760年），孙髯翁为一位窦姓老先生祝贺七十寿辰时写的《贺寅翁老先生七秩荣寿》诗看出：“庚辰正月夫载阳，天晴瑞霭郁相望……主人今年年七十，双瞳剪水含珠光……座上一叟七十五，一叟七十二相雁行，一叟七十身体胖，皤然白发两髯苍……”诗中所言的几位老者，除主人外，应该是包含孙髯翁在内的三位老者，年龄都在七十岁以上，然而据史料记载，孙髯翁个子矮小，容貌清瘦，他不可能是“七十身体胖”之人，其余只有“七十五”和“七十二”两种可能了。而按七十五岁来计算，往前推七十五年，正好就是易老先生考证的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岁。

另据清倪蜕《滇云历年传》记载，清兵是以康熙二十年辛酉岁（公元1681年）十月“二十八日，克云南，入其城”的。如果孙父此时随清兵入滇，那么他宦滇

两年后，正是他择偶成家的最佳时期，孙髯翁于康熙二十四年出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关于孙髯翁的父亲入滇这事，下文将详细分析。

那么孙髯翁逝于何时呢？

据孙髯翁的学生师范所著《滇系·艺文十七》载：“戊子秋，予见其门联，心异之，抠衣入谒，白须古貌，兀坐藜床上，如松荫独鹤，互相问询，乃以诗请。拍案敷陈，目光炯炯射人。自是时携饼饵与谈，辄至暮始返。”这里记述的“戊子岁”即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髯翁八十有三，师范公前往咒蛟台拜谒孙髯翁的情景；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岁（公元1770年），师范再次拜访，先生依然耳聪目明，神志清醒，走路不用藜杖，时年孙髯翁已85岁。

又一个例证是，孙髯翁有诗作《辛卯观诸生入闱》。辛卯岁即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这首诗应该是当年八月孙髯翁观摩贡院考场后的作品，说明当时孙髯翁还健在，其时86岁。

再据赵椿先生《联圣孙髯身世及生卒年考》：“先生的女婿在弥勒赶马经商，往来于师宗、丘北、泸西和弥勒间，为人忠厚，家道殷实，为尽半子之责，于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岁（公元1772年）将先生接到弥勒奉养。他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了两三年，先住弥勒新瓦村，后迁至三道桥村，以教书为生。”“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岁（公元1774年）春正月初九日玉皇诞辰，先生跨鹤西归，享年九十上寿。苗雨亭公感念至交之情，将先生殡葬于弥勒城西苗氏莹地。”以此计算孙髯翁应当生于公元1685年。

孙髯翁平民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孙髯翁所处的时代跨越了清代康熙、雍正与乾隆三个时期，历经近百年。就是许多史书称之为“康乾盛世”的年代。清朝替代统治了二百七十六年的朱明王朝，这不仅仅是朝代简单的更迭，而是政治格局、文化思想、传统价值观念的重新组合。

特别是在清朝初期，新旧政权的交替、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中央为巩固集权统治与地方为维持小团体利益的冲突，皇室上层领导集团内部的钩心斗角等等矛盾都集中暴露无遗。在民间，“反清复明”的思潮与行动一直延续到大清王朝统治的三百余年漫长的历史时期。

尽管清军入主中原以后，为保证国家统一，在抵御外国入侵、打击国内分裂势力，如平息“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与澎湖列岛，以及倡导汉学、遵从儒家、信奉佛教等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实施了大量举措；在人事制度上，启用了一批汉族的社会精英，如洪承畴、张廷玉等人。但是清朝统治集团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利用掌控的政权工具，仍然实施高压政策与措施。例如，实施“文字狱”。为了禁锢文人的思想，清朝统治者将文字狱扩张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后果更加引发了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和叛逆的心理。特别是一些不得志的民间下层文人，他们的诉求得不到满足，自身的价值得不到认同，只能追根溯源，以汉文化为本，



寻求心理平衡。

另外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明朝中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虽然云南整体还处于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但以初级工业和商贸活动为代表的新兴经济萌芽已经开始诞生。明嘉庆三十四年（公元 1555 年），云南开始铸钱，每年上缴户部三万余。清代一些手工业逐步演进到初级工业化，康熙二十一年（公元 1682 年）蔡毓荣任云贵总督，到任后上《筹滇十疏》，其中第四疏专门讲矿产开发。他提出“广示招徕，或本地殷实有力之家，或富商大贾，悉听自行开采，每十份抽税二份。”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政府不仅大力发展矿产业，而且在产业化中积极鼓励投资多元化。

在雍正年间，仅云南东川地区就兴建了 31 个铜矿厂，平均每年产铜 800~900 万斤，一批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乾隆时（公元 1736~1795 年），云南出铜每年达六七百万斤或八九百万斤，最多时达一千二百万斤，因此《清史稿·食货五》说：“滇省铜政，累叶程功，非他项矿产可比。”

盐矿也是当时云南的重要非农产业，据《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九百二十》记载，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壬辰朔（公元 1772 年 11 月 25 日），户部议复云南巡抚李湖酌盐井各事宜：“省城向设总店，分立大铺一百二十处，行销黑井、安丰井盐九百一十一万一千七百六十余斤。除南宁、沾益、寻甸、平彝、宣威等五州、县官运盐一百七十万斤，其余转销于迤东之昆明等十六属民返运销。”此一史料展示了云南盐产业的生产规模，特别是记录了“官”“民”多渠道参与特殊商品市场营销的模式。

及至道光二十四年（公元 1844 年），帝诏云南、贵州、四川诸省，除已开采者外，如尚有其他矿愿开采者，“准照现开各厂一律办理”。二十八年，又诏云贵、两广等省督抚广清查矿源，积极开采，至于开矿是官办、民办或商办，“朝廷不为遥制”。清廷有此态度，“一时矿禁大弛”。其时云南除重开一部分明代已封闭的银矿外，还新开了茂隆、募乃等民营大银矿。茂隆银矿位于云南孟定府西南佤族地区，繁荣时有矿工约 3 万人，年产白银上万两。募乃银矿位于今云南澜沧县北部，相传繁盛时有 360 座冶银炉日夜冶炼，矿工达 10 余万人。

清代昆明的太和街商贾云集，有安徽、浙江、四川、广西、广东以及迤西的地道药材，有经营三迤的鹿茸、虎骨、熊胆、麝香、虎皮、豹皮、麂皮、狐皮、牛羊皮以及木耳、白生、笋丝、普洱茶等山货，还有东川的铜、锰、铅，个旧的大锡、黄草坝的棉纸以及四川的烟叶等等，成为南来北往商品的集散地，商贾的力量逐渐增强，成为新的社会群体。

物流、信息流的增大、财富的积累，使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初级工业的兴起与商品交换的新形式促进了社会分工，新的生产关系初见端倪，人们渴求自由、张扬个性成为新潮流。经济的繁荣、社会交往的扩大，更是初级

民主思潮的助推器。经济的迅速增长与意识形态的严格管控，形成了此消彼长的严重反差，孕育着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殒命后，明朝的遗老遗少们拥戴地方藩王建立南明政权，以李定国为首的反明农民起义军顺势而变，迅速将战略调整为“反清复明”，用武装割据的方式顽强地对抗新兴的清朝政府，以争取获得主流政治的地位。

当时中国底层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普遍认同“反清复明”的思想，但是他们在与清朝政府的对垒中却是弱势群体。他们不可能用刀剑做武器，伸张自己的政治诉求，而只能用笔墨为武器，借助诗、词、文章、小说等文学作品，含沙射影地、迂回曲折地、隐晦地表达自己的心声与情感，宣泄愤怒、显示反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与孙髯翁同时代的曹雪芹，他所撰写的《红楼梦》，被许多红学家认为是通过对四大家族兴衰历史的描写，揭露封建社会灭亡的必由之路。无独有偶，孙髯翁在昆明大观楼撰写的180个字的对联，被人们誉为“天下第一长联”，除了艺术性以外，许多人认为它是大清朝灭亡的挽歌。更有人赞誉说当时中国文坛，北有曹雪芹，南有孙髯翁。孙髯翁是否能与曹雪芹比肩，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推而广之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只能用手中的笔摇旗呐喊、鼓动人心。

拥有地方武装的集团与发散的知识分子，两股或明或暗的力量交集在一起形成了反抗清朝的势力。当清政府平息武装割据之后，弱小的知识分子群体便成为与清政府博弈的一支潜在的力量。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主要是在青少年时代。而孙髯翁的青少年时期，正是清朝初期向中期过渡的时期。因此，他的平民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二）家庭背景

孙髯翁个人的思想、品质、性格的形成与家庭的熏陶密不可分，特别是父亲对他的影响。

家庭是社会的单元细胞，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封建社会，家庭是生产单位，族群生活的团队，更是传统文化传承与接力的重要载体，父母自然成为子女的第一个启蒙老师。父母的社会经历、文化水准、道德情操、价值取向，直接地、潜移默化地影响、塑造着下一代，家庭对人的影响是社会背景的微观层面的问题，但是这种影响力却是其他因素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孙髯翁也不例外。

说到家庭对孙髯翁的影响，就有必要对他的父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因此，本书花了一些笔墨对其父的经历进行了介绍，以期对孙髯翁思想、性格的形成做一个铺垫，再次说明孙髯翁平民思想形成的必然性。同时也展示了明末清初，陕、川、滇地区风云汇聚的历史场景。



孙髯翁虽然是历史名人，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介布衣，所以史料中关于孙髯翁的生平事迹记述的并不多，对于其父及家庭的记载就更为罕见。对其父及家庭的记载，只有清朝大理赵州辛野村人（今弥渡）师范（字荔扉，又称金华山樵，生于公元1751年，卒于公元1811年）在《滇系·孙髯拟输捐直省条丁缓征逋欠谢表后记》中提到的“髯字髯翁，陕西三原人，其父以武职宦滇，遂家焉”等寥寥数语。

孙髯翁的学生董懋泉在其《题髯翁夫子凯歌后》中有：“身在天涯心在秦，白头信庾泪沾巾。客中作客难为客，春日寻春那当春。六诏应多新地主，三原岂少旧乡亲。近华浦上波千顷，不信云南有此人。”

因此孙髯翁的原籍是陕西三原县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其父何时入滇？为什么入滇？跟随什么军队入滇？是清军、大西军残部（李定国部），还是南明军队“为宦”？是什么级别？这些关键的细节至今仍然是个谜，包括孙髯翁的故乡三原县至今都未发现任何有关记载。

依据当时的情势来看，清军攻陷北京以后，南明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的福建、广东与广西一带，此后向西南的贵州、云南游走。因此，孙髯翁的父亲不可能自西向东辗转千里投奔南明军队而后入滇。其入滇的路线极大可能是从陕西经四川、黔西南进入昆明。

那么究竟是随哪支军队入滇呢？这更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顺治初期，清军的战略部署是，在消灭李自成以后，一路南下彻底剿灭南明残余势力；另一路则挥师西南，歼灭部分南明力量，同时击败张献忠的大西军，完成一统天下的大计。

当时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率领的清军与张献忠的大西军在陕、川地区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态势。

陕西人历来争强好武，清军要进攻四川，需要在陕西地区招募士兵增加兵源，而孙髯翁的父亲正是那时加入清军而后入滇，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例如，祖籍陕西榆林的赵良栋（公元1621~1697年），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军平定陕西时应募从军，屡建奇功，成为清军骁勇善战的名将，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率兵攻克成都，擢升为云贵总督，次年与彰泰等攻下昆明，平定三藩之乱。

另一种可能性是，孙髯翁的父亲跟随李定国为首的大西军残部入滇。

明末清初，全国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陕西地区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的势力最为强大，许多穷苦农民纷纷加入义军，三原县地处关中地区，自然也深受影响。

从细节来看，顺治初年孙髯翁的父亲仅十二三岁，即使清军要抓壮丁补充兵源，也不至于让未成年的他去充当炮灰，所谓当兵吃粮，是要出力卖命的。如前所述，赵良栋受清军招募时为二十四岁，正当其时，因此加入清军。反倒是义

军中儿童从军的不少，甚至在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中就有成建制的“童子军”，著名抗清将领李定国十岁时投奔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就是最好的例证。

再从另外一个细节来看，师范对孙髯翁父亲的记载暗藏玄机。首先，孙髯翁与师范是忘年交，师范对其家庭应该是知根知底，但是他却没有交代孙髯翁的父亲的名字（本书中“孙建仁”是作者的虚构）、何时、随何人入军与入滇以及官居何位？这对于一生严谨、著述颇丰的文学家、史学家的师范来说，绝不可能是偶然的疏漏。时间、地点、人名这些都是每一篇记叙文的关键词，何况史实？

反复仔细阅读师范的那几句话，可以找到谜底。

纵观古今中外，所谓史实，其实是实中有虚的文字。史学家对于自己（或社会）认同或服务的人，总是遵循隐恶扬善的原则，采取褒奖的手法，而对于那些既不能回避、又不能不讲之的难言之隐的事件，只好采取模糊的手法，例如正史中对于光绪皇帝之死的记载便难以自圆其说，而成为历史悬案。

师范正是采用了这样的惯例。记述孙髯翁的父亲跟随大西军入滇的事实，对于师范来说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如果照实写，无疑有歌颂前明（朝）之嫌，以至于暴露了孙髯翁的身世引来祸端。因此，师范对于难言之情采取了模糊的手法。

反之，如果孙髯翁的父亲是随清军入滇，那么他应该是为大清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官宦，功成名就之后应该是衣锦还乡，师范在撰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本可以大书特书，即便不使用赞誉之词，至少也不用刻意回避。师范用心良苦的有意模糊，留下了一个历史的空白与悬念，也为300年后的人留下了一个想象的空间。

孙髯翁的父亲在大西军、南明军队的经历（估计只可能是一个中下级军官），接受了“反清复明”的思想，这种思想基因必然传递给他的儿子——孙髯翁。这可以从后来孙髯翁的平民反叛思想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反馈与呼应。

当然，孙髯翁的父亲为什么滞留、寓居昆明又是一个历史的空白与悬念而无法考证，这又为作者留下了创作的空间。

关于本书的另一种写法是，取消第一章《亡命从军》而直奔主题，这样产生的不足之处是，使人感到孙髯翁的成长及平民思想的形成较为唐突。因此，之所以要花费一定的笔墨编写“亡命从军”一章，作者试图为孙髯翁的成长及平民思想的形成做一个系统地链接与铺垫，算是本书的楔子吧。

二、孙髯翁平民思想形成的过程

如前所述，孙髯翁平民思想的形成主要是社会背景与家庭影响。从他的自身的经历来看，其平民思想的形成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或者称为启蒙期。这一阶段主要受其父母及净明和尚的影响。南明军队失败后，孙髯翁的父亲一家滞留、寓居昆明，生活极其清苦，父母日夜操劳、含辛茹苦，姐姐幼年病逝，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父母节衣缩食送孙髯翁



上私塾，这一切在孙髯翁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埋藏下了怨恨世道不公的种子。怀着报效父母养育之恩的单纯思想，孙髯翁苦读“四书五经”，试图通过科举获取功名，从而光宗耀祖。但是当他目睹了官场的黑暗，特别是亲身经历了科考的腐败，点燃了他内心的愤慨，立誓终生不再参加科考，毅然决然地断绝了入仕的渠道，这对于当时的一个文人是需要极大的勇气与魄力的。虽然这一举动是一种冲动，但是正是这种冲动，彰显了孙髯翁特立独行的个性与可贵的品质。也正是雍正初年的“秋闱风波”，成为孙髯翁平民思想的起始点。

孙髯翁对科举制的深恶痛绝，也体现于他在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写的《辛卯观诸生入闱》一诗中：“唱名胥吏嫌字难，趁空馀丁劫横财。清代不妨金厚许，咨询打点笑先开。”辛辣尖刻地讽刺了“胥吏”的愚蠢、贪婪与弄虚作假的丑陋现象。

许多文人墨客都以菊花为题吟志，在孙髯翁身后留下的诗篇中，有多达十首是以菊花为题材，自称“万树梅花一布衣”的孙髯翁对梅花情有独钟，但却鲜见他对梅花描述的文字，通过对菊花的咏叹，孙髯翁清高孤傲的个性跃然纸上。

第二阶段，或者称为成长期。孙髯翁的原始平民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

在这个阶段，一方面，孙髯翁以明朝为正统的思想越加显现。他两次游览武定狮山，都以明朝建文皇帝为题作诗。其一为《春日登狮山》，其二为《再游狮山吊建文帝》，对大明朝的兴衰感叹不已。特别是《春日登狮山》，孙髯翁不惜笔墨、独具匠心，以118句、近600个字的叙事长诗的形式追忆建文帝，或许创造了他自己最长诗作纪录。此外，在《岳武穆》《花木兰歌》等诗词中，孙髯翁借用“抗击金兵”“抵御外辱”的典故多次凸显了其灵魂深处的正统意识。

另一方面，面对现实，孙髯翁把拯救民生的希望寄托于个别清明的官员身上，最突出的就是体现在他对鄂尔泰的认识。初期他认为鄂尔泰是一个文韬武略、清正廉洁的地方官员，幻想他能普惠民众，于是不仅帮助鄂尔泰出谋划策治理滇东北、开发金沙江、治疗弥勒瘟疫、整治盘龙江，而且还身体力行，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平民思想。但是他的希望之梦一个一个地被打碎，目睹弥勒、大理等基层官员的昏聩，米贴彝民惨遭杀戮，他逐渐看清了以鄂尔泰为代表的统治者的真实面目。

第三阶段，可称为成熟期。历经磨难的孙髯翁彷徨了，但是他没有消沉，他用他自己特有的方式对抗统治者。

在晚年的时候，他宁肯寓居在圆通寺的石洞内过着清贫的生活，而不再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他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在《咏烧茄》一诗中，风趣地写到：“未过屠门嚼，取茄漫火烧。不须叹四簋，也可醉千瓢。”又如，在《咏茭瓜》一诗中写道：“淡薄平生志，茭瓜较肉嘉。绿排江上阵，香老

水之涯。”

他用自己的才学与经历，撰写了脍炙人口的大观楼长联，深情地赞美昆明风情、精准地解读历史，借景抒情，抒发了内心的情感。孙髯翁以八十余岁的高龄在弥勒兴办义学，“门墙桃李，一时称盛”，坚忍不拔地践行着自己的平民思想的崇高理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重压之下孙髯翁并没有消沉与退缩，他没有像同朝的唐泰（即担当，昆明晋宁州人）一样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出家做了和尚；更没有像有些文人墨客借酒消愁、怨天尤人、悲观厌世。在《自挽》一联中孙髯翁写道：“五十年经史罗胸，也喜饮酒，也喜看花，开平丧乱，饱经过百事无成，只诗卷长留天地；八十载光阴弹指，不愿升仙，不愿作佛，宝贵功名，如梦灯一端最好，有书香付与儿孙。”充分表达了他的心迹。通观孙髯翁留下的所有诗、词、楹联、文章，没有丝毫消极情绪，这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不能苛求于前人，让孙髯翁去剖析大清朝的弊端在于封建社会的制度，这有悖历史；不能设想让孙髯翁像他的父辈一样去参加或者组织起义军，用武力推翻清王朝，或者像禄阿木一样去行刺鄂尔泰。如果是这样，世界上就没有了孙髯翁，却多了一个荆轲式的勇夫。

孙髯翁的原始平民思想还贯穿在亲情、友情与爱情方面。

父亲是他的偶像与楷模，母亲含辛茹苦、通情达理，父母的养育之恩、舐犊之情，孕育了孙髯翁与父母的难以割舍的亲情，他自诩为“万树梅花一布衣”，并将女儿取名为“春梅”，一个“梅”字，凸显了他内心深处对父母的情愫，足见他对父母的深情厚谊。

身为人父的孙髯翁对女儿也是关心备至，尽管他将春梅托付在弥勒苗雨亭家，但他无时无刻不在惦记女儿。史料很难记载这些凡人琐事，因此，孙髯翁经常往来于昆明与弥勒之间应该是在常理之中的事情。及至他的晚年投靠女儿、女婿，使弥勒成为他的最后、最好的归宿之地。

孙髯翁与苗雨亭、师范、清虚、李因培等友人，以文会友、相互酬唱，危急时刻出手相援、生死与共，与那些狐朋狗友、酒肉朋友相比，其友情何等潇洒、高雅、崇高！

孙髯翁早年丧妻，此后便没有再娶。禄阿木与他邂逅，她从敬重，暗恋到表白真情，而孙髯翁始终保持着不伤害弱者的信条，这种严肃、刻板的观念近乎迂腐，但正是这种迂腐、冷酷造成了他们两人之间戏剧性的矛盾与纠结，从而谱写了大千世界下最纯真、最忠贞的爱情之歌！

需要说明的是，孙髯翁被世人称为“联圣”，但是他绝非圣人。他清高孤傲、不拘小节、刻板迂腐、嗜酒如命，特别是他的诗词并非都是精品，例如其所作长诗《春日登狮山》，就显得冗长繁杂、立意浅显，然而瑕不掩瑜，由于这些性格